

# 材料的声音: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的选材策略

叶 晔\*

〔摘 要〕 钱谦益《列朝诗集》中的明代诗歌史观,除了鲜明直白的评论表达外,还深植于各种精致的选材策略与叙事技法中,这可从诗歌选源与传记史源两个维度予以考察。在叙事层面上,基于作家文学思想的复杂性,钱氏对史料拼接后文本缝隙及语意随语境转换法则的利用,有效地取舍、编排甚至曲解原始材料,在不表达倾向性意见的前提下,制造出为己所需的叙事效果,是为一种隐性的文学批评模式。这种叙事技法的存在,应引起我们对传统诗话、笔记中史料客观性的反思与再认识。

〔关键词〕 钱谦益;列朝诗集;史源;选材策略;叙事技法

在中国历代诗学文献中,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是一本特别的书。严格意义上说,它只是后人摘编《列朝诗集》这一断代诗歌总集中的诗人小传而成,但其中所表达出的对明代诗歌史的系统建构,以及对明代诗学理论的确立立场和激烈诉求,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很多诗学著述。故从诗学文献的角度来说,《列朝诗集小传》包蕴了丰富的文学批评价值,此为正常的思维对应关系,读者皆可想见,故相关研究成果已经不少<sup>①</sup>。而本篇的目的,则是跳出这一习惯思维,从传记文献的角度切入,通过细究传记的选材和叙事策略,来错位考察《列朝诗集小传》的文学批评价值,为钱谦益研究甚至明清诗学研究提供一条可资补益的观察路径。

## 一、皮里春秋:《列朝诗集小传》的别样观察维度

现今学界对《列朝诗集小传》的态度,基本上认为钱谦益在字里行间注入了相当鲜明的褒贬臧否之态度,并借此书写了一部别体的明代诗歌史。总的来说,钱氏在书中力倡馆阁文学传统和吴中文学传统,而对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文学及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文学,予以猛烈的抨击。考虑到钱谦益的观点和立场对后世的明代文学批评有着深远的影响,如《静志居诗话》、《明史·文苑传》,以及《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明别集提要,皆带有钱氏“明诗史”的若干印迹。在某些特定的时代,如上世纪后半叶,在评介明代诗人时征引几句钱氏的评论文字,甚至成为一种常态和惯习。

\* 文学博士,浙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310058。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明诗话新编”(13&ZD115)、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代士官制度与士大夫文学格局研究”(11CZW040)的阶段性成果。

① 以前、后七子批评为例,就有张爽:《钱谦益对明代“后七子”诗派态度发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和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之比较》,《明史研究》第13辑,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谢佩真:《制作明代前后七子——以清初、中期三书为探讨核心》,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但以上成果皆专注于小传中的评论文字,对叙事文字未作留意。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列朝诗集》中的每篇小传,都是由叙事文字和评论文字两部分组成的。那些常被拿来作为论证材料的,其实是后半段带有浓郁钱氏色彩的评论文字,而对前半段的叙事文字,多认为属于客观陈述,钱谦益只是摘编材料、重新撰写一遍而已,未对其中的文学态度作太多的探究。加上钱氏自述《列朝诗集》“仿元好问《中州》故事,用为正史发端,搜摭考订,颇有次第”<sup>①</sup>,这种端正求实的学术姿态,更加深了读者对其中叙事文字的信任程度。但事实上,钱氏通过对原始材料的选择性使用和编排,以及利用语境转换下的曲解语意、偷换概念等手法,可以在不发表个人主观见解的情况下,让材料自己发出接近编者文学观的声音。

这种写法,本是中国古代史传书写的一大传统,可视为春秋笔法的一种变形,且《春秋》学一直是常熟钱氏的宗族治经传统。钱谦益幼时受业于父亲钱世扬,白云“仆家世授《春秋》,儿时习《胡传》,粗通句读则已,多所拟议,而未敢明言。长而深究源委,知其为经筵进讲,箴砭国论之书。国初与张洽并行,已而独行胡氏者,则以其尊周攘夷,发抒华夏之气,用以斡持世运,铺张金元已来驱除扫犁之局,而非以为经义当如是也”<sup>②</sup>。若我们将钱谦益对胡安国《春秋传》的理解,与《列朝诗集小传》的书写态度相对照,不妨作如下观看:其“箴砭国论”说,变为书写一代诗史、评论各家诗人的行为;其“尊周攘夷”说,化为对明代不同文学流派的爱憎分明的批评态度;其“斡持世运”说,则是钱氏通过对明代三百年诗歌的总结,以惨痛的经验教训来展望新时代诗歌的发展前景。只不过诗人小传的文学特质,较之正统的史志传记,不易引起读者对其中春秋笔法的关注;而这些诗人小传又被置于篇幅浩繁的断代诗歌总集之中,更显得微不足道而少有人留意了。

虽然相关的案例论证和分析尚未展开,但笔者有意指出,《列朝诗集小传》作为一部传记类诗话,其每篇文字至多可分四个板块:即政治履历、文学轶事、诗论征引、直接评论。并不是每篇小传都包含这四个板块,但每一板块的论说在小传中确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前两个叙事板块中,钱谦益通过对诗人的政治履历、文学轶事等材料的取舍、编排和曲解,塑造出一个看似平允的历史人物形象,实则隐含了对诗人的基本道德评鹭;在第三个板块,他通过对诗人诗学观点的选择性引证和阐释,进一步明确自己的批评立场。以上三块,钱谦益虽一直未动声色,却已经在读者的潜意识中作了充分的价值铺垫,以致最末提出旗帜鲜明的褒贬之论时,显得顺理成章。在某种程度上,此策略与宋人“作诗话以党同伐异”之事并无太大区别,只不过宋人作诗话攻政治之朋党,而钱谦益作诗话攻文学之朋党罢了。

## 二、材料的取舍:对作家文学思想复杂性的利用

任何作家,究其文学事业之一生,不可能一成不变。其文学思想的复杂性,至少可以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文学思想随人生经历而变化,老、中、青时代的观念多有不同;二、即使在同一时段内,很多作家亦存在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之差异,甚至背离,无法保持文学事业的言行合一;三、即使是同一时段的同一套文学观念,也可能因表述语境的不同,而表现出细微的差别来。故有些材料间的矛盾,并不意味着作家思维的混乱无序,或道德的左右骑墙,只是在不同时空发出不同声音罢了。然而,在撰写一篇简要的人物传记时,对不同时段、不同语境中的材料应如何取舍,却成为至关重要的一件事。

钱谦益编纂《列朝诗集》并撰写小传,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学术工程。有明一代,文学流派众多,文学论争异常热烈,要梳理得井然有序,并非易事。我们可以想见,钱谦益为此翻阅了大量的史部、集部文献,然而这些众说纷纭的史料,在为钱谦益撰写小传提供了丰富素材的同时,也为他留下了相当宽

<sup>①</sup>钱谦益:《列朝诗集》甲集卷十“徐布政贡”跋语,《续修四库全书》第16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96页。

<sup>②</sup>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三八《与严开正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316页。

裕的取舍空间。比如那些文学思想有过重大转变的作家,就成为钱谦益分裂其对手阵营、拉拢入己方阵营的绝佳目标。其乡贤徐祯卿,便是典型。《列朝诗集小传》记徐祯卿事迹如下:

祯卿,字昌谷,一字昌国,常熟人,迁吴县。天性颖异,家不蓄一书,而无所不通。与吴趋唐寅相友善,寅荐于沈周、杨循吉,由是知名。屡台试不捷,感屈子《离骚》,作《叹叹集》,论者以“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为集中警句,虽沈、宋无以加。又断作诗之妙,为《谈艺录》。弘治乙丑举进士,除大理寺左寺副,乞徙南就养,会失囚,降国子监博士,卒于京师,年三十三。顾璘《国宝新编》曰:“昌谷神清体弱,双瞳烛人,幼精文理,不由教迪。著《交诚》、《感暮赋》诸篇,词旨沉郁,遂闯晋、宋之藩,凌躐曹魏,长宿惊叹,号为文雄。专门诗学,究订体裁,上探骚、雅,下括高、岑,融会折衷,备兹文质,取充栋之草,删存百一,至今海内,奉如珪璧。所谓虽多亦奚以为也。其所研索,具在《谈艺录》中,斯良工独苦者与?”昌谷少与唐寅、祝允明、文壁齐名,号“吴中四才子”。征仲称其才特高,年甚少,而所见最的,其持论于唐名家独喜刘宾客、白太傅。沉酣六朝,散华流艳,文章、烟月之句,至今令人口吻犹香。登第之后,与北地李献吉游,悔其少作,改而趋汉、魏、盛唐,吴中名士颇有“邯郸学步”之诮。然而标格清妍,摘词婉约,绝不染中原伦父槎牙鼻兀之习。江左风流,故自在也。献吉讥其守而未化,蹊径存焉,斯亦善誉昌谷者与?余取昌谷五集暨《迪功集》参互录之,使谈艺者自采择焉。<sup>①</sup>

钱谦益撰“前七子”小传,对其他六人皆有较鲜明的批评态度,只对徐祯卿一人持引而不论、总体肯定的写法。究其原因,在钱谦益对苏州文学传统的强烈认同感,促使他试图对徐祯卿与复古文学阵营作有效的切割。凸显徐氏身上的南方文学印迹,用“江左风流”来淡化他北上习染的“中原伦父”之气。这篇小传看似平允,然细究史源,竟全部采用吴中文人的说辞:“天性颖异……断作诗之妙,为《谈艺录》”一段,出自阎秀卿《吴郡二科志》<sup>②</sup>;“昌谷神清体弱……斯良工独苦者与”一段,出自顾璘《国宝新编》<sup>③</sup>;“征仲称其才特高……独喜刘宾客、白太傅”一段,出自文征明《焦桐集序》<sup>④</sup>;“标格清妍,摘词婉约,绝不染中原伦父槎牙鼻兀之习”一句,源自何良俊《四友斋丛说》<sup>⑤</sup>。除了最后一句李梦阳的评价,钱谦益用来作反向论证外,其他皆在突出徐祯卿文学创作及思想中的南方地域特质。阎秀卿、顾璘、文徵明、何良俊皆苏松人士,“文章江左,烟月扬州”、“沉酣六朝,散华流艳”、“标格清妍,摘词婉约”诸辞,亦带有浓郁的江南清丽之气。而对徐祯卿北上参加文学复古运动的诸多事迹,钱谦益着墨甚少。除了李梦阳的讥评外,整篇小传未出现一位与之交游的复古作家名讳,甚至连王守仁撰写的《徐昌国墓志》亦未采用。如此倾向性的书写,都是为了塑造出一个典型的吴中诗人形象,以便与复古作家群划清界限。

这种对地域性文学材料的重视,是钱谦益小传书写中的惯用手法。即放大地域文化对作家早年文学观的形塑意义,强调他们进士登第后虽入其他阵营,却熏染未深,初心尚在。对“后七子”梁有誉小传的书写,亦有相似之处。就取材而言,钱谦益直接选用了三种材料:“以念母移病归里……年三十六”一段,出自王世贞《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梁君公实墓表》<sup>⑥</sup>;“公实少师事黄才伯……始复与王、李结社”一段,源自欧大任《梁比部传》<sup>⑦</sup>;而“梁率易,寡世好,尤工齐梁,近始幡然悔之”一句,直接注引王世贞《明诗评后序》<sup>⑧</sup>。以上三条材料,都在为传末“熏染未深”的评价作叙事上的铺垫。除了最后一条采用反向论证的手法,借王世贞的批评之辞来反衬梁有誉的初心未泯外,其他两条皆在凸显梁有誉身上的岭南文

①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徐博士祯卿”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00—301页。

②阎秀卿:《吴郡二科志》“徐祯卿”条,《丛书集成新编》第10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第299页。

③顾璘:《国宝新编》“国子博士徐祯卿”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8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538页。

④文征明撰、周道振辑校:《文征明集》卷一九《焦桐集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58页。

⑤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9页。

⑥王世贞:《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梁君公实墓表》,梁有誉:《兰汀存稿》附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348册,第621页。

⑦欧大任:《梁比部传》,梁有誉:《兰汀存稿》附录,第619页。

⑧王世贞:《明诗评》后序,《明代传记丛刊》第8册,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第104页。



学传统。《梁比部传》的作者欧大任,亦广东顺德人,与梁有誉同为黄佐门生,他的表述带有较强的岭南文学色彩,钱谦益予以采用,自可想见;而梁有誉墓表为王世贞所撰,如何取舍其中材料,就要比《梁比部传》费心一些。墓表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钱谦益予以无视:“公实所最善者攀龙辈,当其在京师,武昌吴国伦最后定交,而谢榛以布衣,故公实亦间游从。其于乡,师事故黄文裕公佐,而友黎户部民表。”<sup>①</sup>显然,钱谦益在此回避甚至颠倒了梁有誉两条诗学源流的主次关系。一方面,他一字未提梁氏在刑部主事任上与李攀龙、宗臣、徐中行“日相与切劘古文辞甚欢”之事;另一方面,却专门着墨于梁氏养病归乡后与黎民表约游罗浮山观沧海一事。两件事都记载于王世贞所撰墓表,一取一舍之间,其用意不言自明。

如果说钱谦益对徐祯卿、梁有誉等南方文人的态度,是突出他们早年的地域文学传统,淡化他们入京以后文学思想之转变,那么,对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北地文人的叙写,则重在暗示他们的道德缺陷或思维分裂。对康海和王九思,钱谦益采用了双管齐下的策略,在政治履历上,突出他们的“瑾党”身份大做文章;而在家居经历上,凸显他们的词曲创作活动,以淡化其诗文复古的人物形象,对此后文另有论述。对王廷相,钱谦益没有采用分文体而论的手法,而是用王廷相诗歌创作中言行分离的事实,来消解诗人的典正形象。换句话说,对徐祯卿、梁有誉等人,钱谦益选择了复古派以外的材料,来“救赎”一位涉世未深的诗人;对王廷相等,则利用复古派内部的史料多面性,突出其中矛盾之处,暗示复古作家在创作和理论上的不成熟。

虽然钱谦益对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的处理,皆采用材料对立之法,来作潜默的道德评价,但对康、王二人,钱谦益基本上是引传记材料,用文学经历来勾勒人物;而对王廷相,他是引诗论材料,用文学主张来勾勒人物。与前几篇传记不同,钱谦益这篇小传的重点,不在生平事迹的梳理和取舍,而在对传主具体文学主张的批驳和商榷,这或与王廷相在政治上立身谨严、无懈可击有关。虽然这属于小传的评论文字,而非叙事文字,但由于仍牵涉材料选用的环节,其中策略有异曲同工之处。

钱谦益在小传中,重点征引了王廷相的两条诗论:“《三百篇》比兴杂出……其托寄亦高且远矣”一段,出自《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sup>②</sup>;“杜子美虽云大家……当何以云”一段,出自《李空同集序》<sup>③</sup>。他在文中顺次引述,无疑是想借助前后的对比,突出复古诗家的狂妄自大,以及相关诗学观的表里不一。对《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的引述,基本上维持了王廷相的原意,即强调“诗贵意象透莹”之论,而对王廷相批评《北征》诸篇“漫敷繁叙,填事委实”,谓之“诗人之变体”的做法,钱谦益表达了“托寄亦高且远”的态度,也算通融宽厚。但他的这份宽厚态度,似为了与后面《李空同集序》中的大言不惭之辞作对比。王廷相通过贬低杜甫来推崇李梦阳的做法,难被多数读者接受,钱谦益也乐于割裂其辞,前后映衬,将这一说法“发扬光大”。故《李空同集序》一文之语境,随着文章的切割和段落的聚焦而改变,钱谦益不改一字,亦可起到歪曲本意的效果:

唐杜子美,词人之雄也,元稹称其薄风雅、吞曹刘、掩颜谢,兼昔人之所独专。今其集具在,虽云大家,要自成己格,乃若风雅、曹刘、颜谢之调有无哉,固知元氏子溢言矣。其视空同规尚古始,无所不极,当何以云。或有言之,古人顺意靡刻,空同则矜持;古辞疏朗达意,空同则援精。浚川子曰:非然哉,厥睹误矣。大观逊炤,虽经坟子史判不相能,以各发舒其华也;揆道逮政,虽尧舜三王靡所总摄,以各际会其变也。况兹以文命乎?率由嗜好,成于性资,安能古今拟议,同一区畛。即云空同子调,亦无不可矣。空同子往与余论文云:学其似,不至矣,所谓法上而仅中也,过则至且超矣。<sup>④</sup>

①王世贞:《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梁君公实墓表》,第621页。

②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二八《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3册,第164页。

③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二三《李空同集序》,第109页。

④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二三《李空同集序》,第109页。

以上这段话,至少有两点值得留意,而钱谦益皆作了失明处理。首先,王廷相并非不知道李梦阳在诗坛上的负面评价,他对“古人顺意靡刻,空同则矜持;古辞疏朗达意,空同则援精”之质疑敢于直面回答,至少说明复古诗家绝非目中无人、大言不惭之辈,亦有自己的理性反思。但在钱谦益笔下,由于删去了王廷相的辩解之辞,他对李梦阳的推崇就成为毫无原则的一味表彰。其次,王廷相强调李梦阳“学其似,不至矣。所谓法上而仅中也,过则至且超矣”的观点,是为了强调诗文创作为“率由嗜好,成于性资”,不可古今同议,学步一家,所以即便像杜甫这样难以企及的诗人,元稹以“兼昔人之所独专”相称,仍属未妥。他认为李梦阳诗歌创作中的矜持和援精,属于学古而超古、自成一家的创作路数,不能因为他倡导学古,便完全以古诗的风骨来衡量其作品。可见王廷相反对的,不是元稹对杜甫地位的认可,而是元稹称杜甫“薄风雅、吞曹刘、掩颜谢”的说法,如果“兼昔人之所独专”成为评价诗歌之标准的话,那么,李梦阳“规尚古始,无所不极”的学诗方法不是更恢弘吗?故他的论述重点,不在学习和笼括前人,而在超越和有别于前人,这样才引出最后“法上而仅中,过则至且超”的论断。钱谦益片段地摘取王廷相批评元稹之辞的最激烈之处,既无王廷相对非李之说的辩驳,亦无王廷相对学诗法径的确凿态度,很容易让读者理解为王廷相在非议杜甫以拔高李梦阳,这当然是多数诗家们所无法接受的。钱谦益紧接着反问“掩蔽前贤,牢笼百代,独空同一人乎”,更加深了读者的这一印象。而事实上,王廷相在《李空同集序》中的学诗态度,是明确反对“掩蔽前贤,牢笼百代”的,主张诗歌随时代及个人性资“各发舒其华”、“各际会其变”,绝不能“古今拟议,同一区畛”。而这些说法,早已被《列朝诗集小传》过滤掉了。另外,王廷相在《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中评价杜甫《北征》、韩愈《南山》诸篇,以为变体、旁轨,有“浅学曲士,志乏尚友,性寡神识,心惊目骇,遂区畛不能辩”之说<sup>①</sup>,可见他非常强调“区畛”这一概念,在两篇重要论诗文章中皆有提及。而一味的学古、拟古,甚至妄图笼括前贤,无疑都是不辨区畛的表现,是王廷相一贯反对的,这实在与钱谦益笔下的狂妄形象有很大的差别。当然,平心而论,对诗论材料的取舍摘录,其隐蔽性不如对传记材料的处理;而在文学张力的制造上,又不能与畅快淋漓的直接批评之辞相比。故对王廷相这位典型的北人、又没有政治丑闻的诗人来说,平直地叙述其生平履历,转而在诗论文字的取舍上作些文章,或是钱谦益退而求其次的另一种诗人形塑之法吧。

### 三、材料的编排:对史料拼接后文本缝隙的利用

对传记书写来说,如何取舍材料只是第一步,尽管这已经在大方向上为人物品鉴定下了总体的基调。但对一篇精细而非草率的传记来说,细节的处理才是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对业已筛选过的材料,如何作出编排,在编排的过程中,又如何呈现甚至制造出多种史料在叙事上的逻辑关系及其层次感,使之更能体现撰者的文学史观,才是传统的春秋笔法的核心内容。

小传较之碑传,虽然在篇幅上有了很大的缩减,但很多文人身兼官员、学者、诗人等多种身份,其丰富而复杂的个人经历,有时会让一篇小传显得头绪众多,顾此失彼。钱谦益的小传书写,对那些较重要的作家,基本上都采用了多线叙事的手法,以突出每一条叙事线的主旨辨识度。王九思小传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九思,字敬夫,鄱县人。弘治丙辰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简讨。[1]九年满考,值刘瑾乱政,翰林悉调部属,历练政务,敬夫独得吏部,不数月,长文选[2]。瑾败,降寿州同知。[3]居一年,会天变,言官钩瑾余党,勒致仕。年八十四乃终。[4]敬夫馆选试《端阳赐扇诗》,效李西涯体,遂得首选,有名史馆中。时人语曰:“上有三老,下有三讨。”[5]既而,康、李辈

<sup>①</sup>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二八《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第164页。

出,唱导古学,相与訾警馆阁之体,敬夫舍所学而从之,于是始自貳于长沙矣。〔6〕敬夫之再谪,以及永錮,皆长沙秉国时。盛年屏弃,无所发怒,作为歌谣及《杜甫春游》杂剧,力诋西涯,流传腾涌,关陇之士,杂然和之。〔7〕嘉靖初,纂修实录,议起敬夫,有言于朝者曰:“《游春记》,李林甫固指西涯,杨国忠得非石斋,贾婆婆得非南坞耶?”吏部闻之,缩舌而止。〔8〕<sup>①</sup>

整篇小传分为三个部分,前两部分讲述王九思的政治履历及其文学牵系,第三部分讲述晚年家居填词度曲之风采(此处未引)。小传基本上以李开先《溪陂王检讨传》为蓝本<sup>②</sup>,评述戏曲部分亦参引了王世贞《艺苑卮言》<sup>③</sup>。当然,李开先的传文长达三千字,钱谦益只能选择性地予以摘写,先将文章分解为碎片化的史料信息,再将本不相连的片段衔接起来,制造出前后连贯的叙事效果。如在王九思政治履历的段落中,钱谦益将相关事迹分为八个片段(引文中数字所示),前四段绑定刘瑾,后四段绑定李东阳,辨识度非常清晰。除了第一片段属完全客观的事实陈述外,其余片段皆有褒贬之意寄寓其中。他对李开先文章的处理之法,主要有三:一、淡化王九思与复古作家交游诸事,即使是晚年家居时,也是突出他和康海的戏曲活动,不涉及诗文复古运动;二、改变李传的单线叙事手法,采用双线叙事,将王九思和刘瑾、李东阳的关系分开叙说,突出王九思品性中的缺陷一面;三、对具体事件作特定视角的叙说,以符合自己的文学观念。比如刘瑾乱政时翰林悉调部属一事,李云“翁得吏部主事”,钱改为“敬夫独得吏部”;李云“弃文墨而理簿书,居无何,由员外升任文选郎中”,钱改为“不数月,长文选”。在李开先笔下,王九思虽调离翰林院,却毫无怨言,敬业爱岗,由吏部主事升至吏部郎中,是他勤于政事的回报;而在钱谦益笔下,无论是“独得”吏部,还是“数月”升迁,都隐隐有着受刘瑾重用的影子。考虑到明代吏部职位的重要性,以及不数月由主事至郎中(正七品至正五品)的火箭式升迁,钱谦益的描述很容易制造出王九思在刘瑾当政时期受到重用的景象。再如降寿州同知、勒令致仕二事,李开先花了大量篇幅叙说:“瑾诛,诸翰林俱复旧,西涯则以旧憾倡言,既官至正郎,不必复可也。言官深恶王纳海,乃并翁劾之:‘堂上堂下,一陕而三吏部,非瑾党何以得此。’”(云南天变)朝议将使大臣自陈,大臣恐有去位者,须屈意求浼司礼监,始得保全。宣言此不系大臣事,乃刘瑾余党去之未尽。”在李开先笔下,无论是未能重返翰林院,还是贬寿州同知,都有李东阳压制的嫌疑,而云南天变后的“大臣恐有去位者”,也有暗讽李东阳派系之意。但钱谦益将之简要地概括为“瑾败,降寿州同知。居一年,会天变,言官钩瑾余党,勒致仕”,虽然省去了不少篇幅,却保留了两个“瑾”字,王九思的一贬再贬,变成了他依附瑾党、咎由自取的结果。在王九思与刘瑾的纠葛中,钱谦益一直没有将李东阳掺入其中,而是在第五至八片段,专门呈现王九思和李东阳的矛盾,依次为受知于长沙、舍长沙而就北地、遭贬而迁怒长沙、因游春本事而未能起复四事。虽未有任何评论文字,但一个师生反目的忘恩形象已经跃然纸上。而事实上,因文学观念变化而在立场上改旗易帜,在古代文人中是很常见的事,至于《杜甫游春》的本事,李开先在传记中早已表明了王九思的态度:“(议止)翁闻之,乃作小词自嘲,殊无尤人之意。”虽说晚年王九思的淡然心态未必能印证他早年的创作动机,但钱谦益对李开先的这句话予以无视,却说明他的小传书写在材料的选择和编排上,有非常明确的使用原则。

在王九思的小传中,钱谦益采用多线叙事的手法,一条线一个主题,来凸显王九思一生的三个特点:依附刘瑾,背弃李东阳,潜心词曲。不管事实是否如此,至少钱谦益的史料编排手法制造出了这样的阅读效果。由于对“依刘背李”的刻画需要,钱谦益在小传中落实了不少明确的时间点,“九年满考”、“不数月”、“居一年”、“馆选试”、“长沙秉国”、“嘉靖初”,哪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一目了然,这让李东阳、刘瑾二人在王九思一生中的正反参照更加鲜明,进一步落实了王九思的政治位置。不过,在另一些

①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王寿州九思”条,第314页。

②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卷十《溪陂王检讨传》,《续修四库全书》第1341册,第260—264页。

③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五二《艺苑卮言》附录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55页。



小传中,钱谦益也会采用消解时间坐标系的手法,模糊材料间的缝隙,达到形塑人物的目的,如李先芳。

李先芳这篇小传,钱氏主要取材于于慎行的《北山先生李公墓志铭》和邢侗的《北山先生濮阳李公行状》,且绝非止取一家。小传中有“大构园亭,广蓄声妓,擷竽撝瑟,二八迭侍,谙晓音律,尤妙琵琶”一句,其中“擷竽撝瑟,二八迭侍”一语,完全袭自于文,而未见邢文;构园亭、蓄声妓、善琵琶三事,仅见邢文,而未见于文,可为明证。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再来看钱谦益笔下的李先芳与李攀龙、王世贞交恶一事,其书写之偏颇,很耐人寻味。其主干叙述,当取材于邢侗所撰行状中的一段话:

先生辛巳向予言:“余为诗成,而于鳞始学诗。余介于鳞于元美,而于鳞悦元美,竞称五子,而余见汰。余归,独往独来,而五子疏。试取余言而与五子较,同乎?异乎?是宜弗相急而寢相遐也。”余时永衿口噤不敢答。<sup>①</sup>

但考虑到钱谦益参考的不止邢侗的行状,还有于慎行的墓志铭,那情况就不同了。

钱谦益对于慎行《墓志铭》中的信息,至少有三方面的处理:一、于文明言“三年政成,擢为户部主事,旋丁外艰,复补刑部”,“顷之,改尚宝司丞”,那么,此处的“刑部”,只可能指刑部主事,即使期间有过升迁,至多刑部员外郎,不可能至刑部郎中,一来迁转所需年限远远不够,二来刑部郎中为正五品,尚宝司丞为正六品,此处若有贬降,两篇碑传不会失载。钱谦益身为明朝翰林,不可能不知道这一常识,但他在小传中直言“迁刑部郎中”,更具可能性的解释,或是为了强化李先芳“左官落薄”的任官经历和形象。二、邢文在履历叙事中未涉及李先芳的文学活动,而是专门在文末以“口述历史”的形式记录了一段当事人的陈述之辞。而于文对李先芳文学活动的记载,则基本上随仕宦经历附带叙述。两相对比,不难发现,邢文中的李先芳文学事迹,缺少时间坐标,而于文则比较清晰。于慎行明确写道,李先芳在刑部的初次结社只持续一年(1547—1548,即进士观政期间),后外任新喻知县三年,嘉靖三十年(1551)回京任户部主事,不久丁忧归,至嘉靖三十三年(1554)补任刑部主事。而著名的《五子诗》唱和,发生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时李先芳正在丁忧,既然未与唱和,自然不入“五子”之名<sup>②</sup>,此理所当然之事。钱谦益在小传中采用了多层叙事,只保留了“嘉靖丁未进士”、“通籍后”两个名异实同的时间点,淡化了时间坐标系,回避了《五子诗》创作与李先芳丁忧之间的时间冲突,制造出一种诗人被刻意排斥的假象。三、钱谦益云“伯承左官落薄,五子、七子之目皆不及伯承”,也是将两条不相关的史料组合成虚假的因果逻辑关系,李先芳虽性格傲睨,多次贬官,但他第一次落职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由尚宝司少卿降亳州同知,其时“五子”、“七子”之称已有十年之久,无论及或不及,都与“左官落薄”之事没有关系。钱谦益这样的拼接叙述,很容易让人理解为李、王等人的炎凉行径所致。通观整篇文字,除了李先芳晚年努目嚼齿、拍案覆杯诸事,来自卢世淮的口耳传闻,以及刑部郎中这一职官记载疏失外,其他情节皆有原始材料可据,绝非信口胡说。但钱谦益通过多线叙事的编排,以及对相关时间坐标的消解,将一些并不构成因果关系的史料衔接组合在一起,制造出极具张力的阅读效果。李攀龙和李先芳之间的文学裂痕,原本只是很普通的一桩旧闻,却在阅读中被渐次强化,实拜钱谦益精致的叙事技法所赐。

#### 四、材料的曲解:对话意随语境转换法则的利用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任何概念或词汇,皆有所指和能指两层含义。语句只要离开了原始语境,其含义将随着读者的阐释诉求而发生变化。因此,在文本的引证和阐读中,难免存在或多或少的误解,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材料的“正解”,有时或可领会还原,有时则难免一厢情愿。故在某种程

<sup>①</sup>邢侗:《来禽馆集》卷一九《北山先生濮阳李公行状》,《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61册,第645页。案:“于鳞悦元美”一句,原作“元美悦元美”,据语意径改。

<sup>②</sup>周潇:《李先芳与“后七子”公案辨证》,《齐鲁学刊》2006年第5期,第84页。

度上,我们第一步应关注的,不是原意为何,而是历代读者对原意是否有故意的曲解。如果不存在这种故意,那么,大家尚可讨论一个如何还原历史真实的问题;但如果存在这种故意,那么,大家更应该讨论一个如何制造历史面貌的问题。

钱谦益作为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对语言指向的灵活和多义,无疑有着深刻的体会,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便是明证,后来学人的发明亦不计其数。其实,对语言多义性的利用,不仅存在于钱谦益的诗歌作品之中,同样存在于他的传记书写之中。只不过在诗歌中,他用隐喻来落实今典,寄托本事;而在传记中,他用曲笔来重塑语意,建构自己心中的胜朝诗史罢了。当他将材料的取舍、编排、曲解三法综合起来运用时,原本颇为显眼的错讹之说,将变得近乎无迹可寻。对谢榛小传的书写,就是这种情况。

总的来看,在钱谦益的笔下,谢榛被描述为一个洒脱纵横的诗人形象。谢榛之于“后七子”的入列和削名,是钱谦益在小传中反复提点的一条暗线。首曰“茂秦以布衣执牛耳,诸人作五子诗,咸首茂秦,而于鳞次之”,次曰“交口排茂秦,削其名于七子、五子之列”,三曰“诸人心师其言,厥后虽争槟茂秦,具称诗之指要,实自茂秦发之”,四曰“七子、五子之流皆不及”,五曰“余录嘉靖七子之咏,仍以茂秦为首”。钱谦益用了这么多篇幅,就是为了突出谢榛在“后七子”早期活动中的领袖地位,以及后来被李攀龙、王世贞诸人舍弃的不平命运。而其中最有力的两条证据,一是诸人《五子诗》以谢榛为首,李攀龙次之;二是谢榛的“唐诗指要”说,发“后七子”复古文学思想之先声。在这里,钱谦益刻意曲解了“五子”的原意。《五子诗》撰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是由谢榛、李攀龙、徐中行、梁有誉、宗臣、王世贞六人参加的一次题咏活动,各人分咏自己以外的其他五人,共得三十篇。现存《宗子相集》中,既收录了宗臣的《五子诗》(谢榛、李攀龙、徐中行、梁有誉、王世贞),也在附录中保留了除谢榛外其他四人的作品,分别是李攀龙《五子诗》(谢榛、徐中行、梁有誉、宗臣、王世贞),徐中行《五子诗》(谢榛、李攀龙、梁有誉、宗臣、王世贞),梁有誉《五子诗》(谢榛、李攀龙、徐中行、宗臣、王世贞),王世贞《五子诗》(谢榛、李攀龙、徐中行、梁有誉、宗臣)<sup>①</sup>。由上可见,钱谦益“诸人作《五子诗》,咸首茂秦,而于鳞次之”的说法,并没有问题,但我们对比诸人作品可以发现,依次顺序为谢榛、李攀龙、徐中行、梁有誉、宗臣、王世贞,正好与六人年齿相对应<sup>②</sup>,即谢榛(1495)、李攀龙(1514)、徐中行(1517)、梁有誉(1519)、宗臣(1525)、王世贞(1526),这恐怕不是巧合而已。如果真的根据诗坛声望来排名的话,即使大家公推谢榛在李攀龙之前,也不会默认王世贞名列最末。而钱谦益“茂秦以布衣执牛耳”的说法,亦非空穴来风,盛以进《四溟山人诗集序》就有“与济南、弇州诸君子互执牛耳,拔中原赤帜”<sup>③</sup>之说。姑且不论盛氏将谢、李、王三人并举,并非谢一人独执牛耳,光是钱谦益将《四溟山人诗集序》与《五子诗》两条材料衔接起来一同叙说,就足以制造出与《五子诗》本意大相径庭的语意效果。原本只是一次以年齿为序的诗歌唱和活动,却被钱谦益解读为谢榛在嘉靖文学复古运动中的先行作用和领袖地位,真可谓材料衔接与语意曲解二法的一次成功实践。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徐祯卿小传的书写之中。钱谦益在小传最后有一句“猷吉讥其守而未化,蹊径存焉,斯亦善誉昌谷者与”的感慨,据小传语境去理解“守而未化,蹊径存焉”这一评价,应是李梦阳认为徐祯卿的文学创作保留了较多吴中文学的痕迹,仍然未能完全进入复古文学创作的殿堂。如此理解,则上与徐祯卿的吴中文学经历相衔接,下与钱谦益“斯亦善誉昌谷者与”一句对李梦阳的嘲讽语气对应,符合上下文之语境。然而,这句话摘自李梦阳的《徐迪功集序》,李的本意似乎与钱的理解大相径庭:

①今《白雪楼诗集》中,李攀龙《五子诗》顺序为王世贞、吴国伦、宗臣、徐中行、梁有誉;《弇州山人四部稿》中,王世贞《五子篇》顺序为李攀龙、徐中行、梁有誉、吴国伦、宗臣。皆删去谢榛而纳入吴国伦,顺序亦有调整,已非原貌,二集最早版本为嘉靖四十二年刻本、万历五年刻本。而《宗子相集》最早为嘉靖三十九年刻本,已附录诸家《五子诗》,且与梁有誉《兰汀存稿》所录文本一致,更接近原貌。

②参见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14页。

③盛以进:《四溟山人诗集序》,李庆立:《谢榛全集校笺》附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361页。



客曰：“群体，迪功奚以之也？”予曰：“《谈艺录》备矣。夫追古者，未有不先其体者也，然守而未化，故蹊径存焉。虽然辞荣而耽寂，浮云富贵，慷慨俯仰，迪功所造诣，予莫之竟究矣。今详其文，温雅以发情，婉以讽事，爽畅以达其气，比兴以则其义，苍古以蓄其词，议拟以一其格，悲鸣以泄不平，参伍以错其变。该物理人道之懿，阐幽剔奥，纪记名实。即有蹊径，厥俦鲜已。修短细大，又曷论焉。”<sup>①</sup>

李梦阳的本意，在强调复古创作当学古而不泥古，若拘守于模拟之法，则痕迹犹存，失之神趣。李梦阳的“蹊径”说，与何景明的“舍筏”说，皆是明中叶的诗论热点，相关评论颇多，无论是认可复古文学主张的，还是反对复古学说的，无论是北人，还是南人，他们都认为李梦阳所说的“守而未化”的“蹊径”，当指泥古的学诗之法：

至献吉犹讥其守而未化，蹊径存焉。仲默云：“论文亦直取舍筏，诚为精确。”余读李、何集中之筏、蹊，有甚于徐者，岂力与志违邪？<sup>②</sup>

尝谓徐君之于诗，可以继轨二晋，标冠一代。斯不诬矣。夫并包众美，言务合矩，检而不隘，放而不逾，斯述藻之善经也。奚取于守化，而暇诋其未至哉？……李子当弘治、正德间，刻意探古，声赫然，君与辨析追琢，日苦吟若狂，毋吝荣誉，卒所成就，多得之李子。而其知君顾未尽，况非李子哉？<sup>③</sup>

何子曰：夫艺家沿袭，自昔为然。即李空同序昌谷之集，讥其守而未化，蹊径存焉。今观李公，蹊径更甚徐生。则知大复舍筏之言，亦欺人耳。<sup>④</sup>

以上顾起纶、皇甫湜、何良俊三家，皆为苏松人士，但他们并未看出李梦阳文中有批评徐祯卿尚存江南诗风的意思。顾、何二人更是将“蹊径”说与“舍筏”说放在一起论述，可见“径”和“筏”在复古诗论中承担着相似的作用，即作为学诗入门的必要工具，以及真正有所成后的超越意义。这是文体学习的共通特征，故何良俊称之为“艺家沿袭，自昔为然”，并不会因风格的差异而有所改变。而钱谦益通过对李梦阳评论的孤立截取，再与前面多位苏松人士赞誉徐祯卿之南方文学特质相衔接，制造出此“径”意指风格取向的假象，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李梦阳在学习方法层面批评徐祯卿的初衷，反而凸显了复古诗人在文学派系上的藩篱意识和保守成见，可谓一举两得。

## 余论：如何看待诗话“资闲谈”的客观性问题

古人传记书写中有所谓的史笔，这本是很常见的事。但是现代学术日渐成熟后，随着学术规范的体系化和史源学理论的成熟，引文要用第一手史料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宋以后的很多史传类文献，因为并非第一手史料，逐渐为研究者们所弃用。从文献征引的角度来说，这固然是学术进步的体现。但这些文献的其他研究价值，似乎被挖掘得尚不充分。如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研究者向来只重视其中褒贬诗人创作及其思想的内容；张岱的《石匮书》，大家则对每篇传记最后的论赞更感兴趣，认为较直观地反映了张岱的史学思想。至于这些作家是怎么选材的，怎么撰写的，都属于技术层面的东西，似乎不及那些直接表明作家立场和态度的文字来得重要。经历了二十世纪的文学革命和新旧学术的更替，现今的学者逐渐忘却了传统文章学中的章法之学，特别是左传、史汉之学，只是一味地在简洁明快的评论文字中追寻古人的思想世界。这与其说是还没有进入到那样的研究深度，不若说是在学术

①李梦阳：《空同集》卷五二《徐迪功集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2册，第476—477页。

②顾起纶：《国雅品》“徐博士昌谷”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15册，第337页。

③皇甫湜：《皇甫少玄集》卷二三《徐迪功外集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6册，第649页。

④何良俊：《何翰林集》卷九《剪彩集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2册，第81页。

理念上对传统文章之学的一种倒退。

《列朝诗集小传》有它的特殊性,若把它看作传记类文献,它只是从一部断代诗歌总集中摘抄出来而已,在传记的规范性和完整性上,不可与其他群体性传记共语,而且钱谦益一直被视为诗家而非史家,读者更习惯将关注焦点放在那些剑拔弩张的评论文字上;若把它看作诗话文献,它与传统的“话诗”、“评诗”之体又不同,很少涉及具体的诗歌文本,更像在“话诗人”、“评诗人”,是为综论而非细评之法。然而,元明以后,文人对诗话概念及其边界的理解,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类似《列朝诗集小传》这样的传记类诗话,早已成为诗学文献的一大宗。更关键的是,无论是从诗话、笔记之文类角度考虑,还是从资闲谈、品人物之功能层面考虑,我们都一直将之视为文人轶事的一个史料宝库。一旦《列朝诗集小传》中的叙事文字,可以有如此大的表现作者文学思想的空间,那么,对其他类似诗话、笔记史料的使用,我们是否也需多留一个心眼?毕竟任何文章皆有其叙述重心和叙述层次,相关材料的取舍和论述角度,皆因叙述重心和层次的变化而有所调整,在此过程中可能造成的某些信息的偏离和失实,是我们在使用诗话、笔记文献时需适当考虑的一个问题。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通过以上论述,我们至少认识到:一、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有着相当丰富的史源文献,而且大多来自墓志铭、墓表、行状、文集序等第一手材料,既非简单地摘抄他人小传而来,也非钱谦益凭学识草草成文,洵属用心之作;二、钱谦益对诗人形象的塑造,带有较为强烈的私人情绪,他在传记书写中体现出的选材策略,是与他尊馆阁贬复古、尊吴中贬竟陵的明代诗学体系相对应的。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那些知名诗人,因为留存了较丰富的传记文献可供对比,我们可以将钱撰小传视为研究其文章技法及诗学思想的一种素材。但对那些未知名的诗人,一旦没有碑传文献甚至别集文献存世,我们是否可以给予《列朝诗集小传》充分的信任,借此来勾勒他们的大致生平?当坚实的文献征引和精致的文章技法共存的时候,我们如何在二者平衡中抽绎出为我所需的史实信息,并确保其面貌不受写作技法的影响而有所扭曲?这恐怕是更深层次地挖掘《列朝诗集小传》学术价值的一种尝试,不再是简单、固执的真假判别,以及一味地批评或褒扬。

(责任编辑:邓晓东)

## Voice of Materials: Strategies for Selecting Materials in

### Qian Qianyi's *Liechao Shiji Xiaozhuan*

YE Ye

**Abstract:** Besides direct comments offered in his *Liechao shiji* 列朝诗集 (an anthology of poems from different dynasties), Qian Qianyi's view on the poetic history is also embodied in his selection of materials and his narrative skills for compiling this anthology. This can be examined from the following two dimensions: the source of the selected poems and the origin of the biographical account of the poets. In terms of narration, due to his characteristic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literature, Qian Qianyi took great advantage of the interaction among different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of the principle of re-contextualization of some key notions in the new context form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materials he selected from different sources. His selection and even manipulation of the materials has actually produced a narrative effect he wanted to achieve. However, this is made under the guise of an impartial narrator, thus forming a type of implicit literary criticism. The existence of this kind of narrative techniques requires us to reflect on and re-examine the objectivity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included in the traditional scholarly writings on poets and poetry.

**Key words:** Qian Qianyi; *Liechao Shiji*; historical origin; strategy for selecting materials; narrative skill